

一個  
遊蕩者  
的世界

許知遠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 港版序言

「克萊爾學堂」，我嘟囔一聲，仰頭倒在後座，享受暫時的休憩。這是凌晨六點，我搭倫敦的早班車抵達劍橋，走出窄小車站，一頭鑽進出租車，宿醉令人疲倦不堪。

但，車沒動。「克萊爾學堂」，我又大聲說了一句，以為他沒聽清。與東京一樣，劍橋的出租車司機也多是老者，白髮蒼蒼或頭髮稀疏，威嚴與慈祥並存。

車仍未動。大概我片刻從暈眩中清醒，意識到此，拍了拍駕駛座。他轉身看我，一張橢圓形的臉，鷹一樣的鼻子，眼神平靜，像是一部老電影裏的管家。「你是不是忘記了一個詞」，看我一臉茫然，他加了一句，「Please」。

是的，得體的表述應該是「Clare Hall， Please」。收到我的歉意之後，發動機啟動了，他的冷峻也退隱了，開始絮絮叨叨。1979年，他剛從波蘭來到英國，要努力學習這裏的一切，包括無處不在的 Please。我猜，他是那一批

東歐移民之一，一心逃向一個新世界。意外地，他讓我想起石黑一雄筆下的老式英國——一股落日餘暉。這也是弔詭的一刻：在這個也曾飽受折磨的波蘭人眼中，我也是某種新型的野蠻人吧，對傳統、習俗缺乏體悟。

一些時候，我的確覺得自己像個「野蠻人」。來自一個古老文明，卻常感到自己是一個現代世界的遲來者，總為自己的學識、語言、口音，感到不安。是的，我是掛名於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的訪問學者，難道研究中國要來到一個大西洋上的島嶼？現代世界確是個從這個島嶼誕生，從約翰·洛克到亞當·斯密，從達爾文到凱恩斯、羅素或奧威爾，他們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而我們畢生的精力，可能只是去理解他們。

我所屬的克萊爾學堂（Clare Hall）是一所過分年輕的學院，晚宴（Formal dinner）也遵循民主之風，不用着長袍（gown），甚至沒有高桌、低桌之分，你仍可以發現身旁坐着《劍橋中國史》秦漢卷的主編，試着給我解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或在寂寞的酒吧間偶遇一位波蘭史家，縱情談論東歐漫長的糾結……我最好的朋友安德魯，面頰消瘦，白髮蒼蒼，帶着匈牙利口音，作為一位研究塞繆爾·貝克特的權威，他第一次讓我意識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原來是那個樣子。他還說起兒時如何與全家來到倫敦，父親為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工作，自己又是如何喜歡上戲劇。我們常在圖書館的茶室一起

喝咖啡、吃司康，分享一種局外人的親密。

這正是我渴望的遊歷生活，在一群性情不同、際遇迥異的世人間，做一個遊手好閒者，東聽一句，西扯五分，所聞頗多，又不求甚解。這與他們的學識多少無關，在某種意義上，來自波蘭的出租車司機，與一位來自布達佩斯的戲劇史權威，對我來說並無分別，他們皆代表一種我不了解的人生。

這本遊記，也正是這些偶遇之產物，它與國別、語言無關。在黑龍江旁的一所磚房裏，我似醒非醒，聽一位老奶奶說起海蘭泡的慘劇；在仰光的街頭，迎着夕陽飲下一杯啤酒，聽到 *Golden Eye*（電影《黃金眼》）的旋律；在特拉維夫，聽見一個香港老闆唱起《我為祖國獻石油》；在檳城的阿美尼亞街上，追憶孫文的往事，還有亞歷山大城的那個湖南廚子，他的小炒肉、西紅柿蛋湯把我從埃及之行的苦悶中解脫出來；或是在橫濱，關帝廟如何讓我想起康有為、梁啟超的往事……

這些記述貫穿了十五年之久。我的寫作也常在未遂的雄心與自暴自棄間搖擺。我曾期待如奈保爾書寫印度一樣，藉由觀察和行走寫出文明之衰亡；也刻意模仿過簡·莫里斯的敏銳，她那種即興的深刻，總能擊中人心；更多時候，我只將旅行視作閱讀的伴隨，是的，我顯然更鍾情的是書籍的鏡像……

我未能變成自己期待的旅行作家，更離一個老練的

旅行者相去甚遠。我從未寫出真正得意的旅行作品，也常憎恨於沒直接投身於冒險之中，去徹底醉酒、擁抱一場真正的戀愛，或是完全置身於陌生人之中，並甘之如飴……

然而，這些偶遇塑造了我，令我總是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隨時可能滑入的偏狹，更一次又一次地確認，一種恆久的不安是所有力量的源泉。

多虧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將這些記憶碎片重新組合，以一種新形態示人。如果它恰能鼓勵起你的旅行熱忱，那就再好不過。

2026年6月

## 目 錄

- 001 向南方
- 054 三峽紀行
- 081 小鎮青年
- 103 劉香成的中國敘事
- 125 活在喧囂的國度
- 146 世界的鳥巢
- 200 劍橋一年
- 230 衰落與新生
- 270 山腰上的中國人
- 283 從吉隆坡到馬六甲
- 313 梁啟超的夏威夷
- 378 難以理解的日本

## 向南方

### 一

「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諾開篇寫道，「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裏，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飢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

臨行前，我意外地翻到這本《紅星照耀中國》。它聲名顯赫，我卻從來沒產生過興趣。我多少覺得，埃德加·斯諾過分單純，但這個下午，我卻感覺到了那種久違的閱讀帶來的怦然心動。

那是 1936 年，他已在中國生活了八年，厭倦了北京封閉、充滿特權的西方人生活：「……飽食終日……在

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裏過着喝威士忌酒摻蘇打水、打馬球和網球、閒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的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牆外面的人間脈搏。」

他決定深入內陸，去探索真實的中國，去了解一群不為所知的共產黨人的作為，他們可能是改變中國的力量。

他的語言比我想象的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陝西的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時，他寫道：「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卡索一樣觸目，隨着陽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着奇異的變化……」

他的觀察也讓人過目難忘，「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毛澤東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在「中日淞滬戰爭中，中國農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繼續種他們的田」。他還有敏銳的感受力，他說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甚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甚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這不再是一本記錄了史料、猜測的歷史書，它讓我躁動。像七十年前一樣，生活在北京的人們容易迷失自己——玻璃幕牆大廈、個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館，比昔日厚厚的城牆、園林建築更容易將真實的中國脈搏隔離在外。

我也厭倦了坐在咖啡館，依靠二手的新聞、漢學家的作品來評論自己的國家，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觀念世界，對於那些具體的肉體、生動的表情、黃土、森林與河流缺乏感性的認識。每過一段時間，成為一名行動者、遊蕩者的願望，就會冒出來。

## 二

離開北京四天後，我最終到了愛輝，它是這次旅行的真正起點。我為自己設定的旅行路線是從黑龍江的愛輝到雲南的騰衝，一個是東北角，瀕臨俄羅斯，另一個是西南角，離緬甸不遠。

如果在這兩點間畫一條直線，它就是中國地理的分水嶺。這條線的東部佔國土面積百分之四十三，卻居住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西部為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七，人口卻不足百分之十。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線，漢族人居住在線的東南，而西部則是滿族、蒙古族、回

族、藏族，還有其他經常被遺忘的少數民族。

地圖上的愛輝—騰衝線，是歷史地理學家胡煥庸的發明。它解釋了中國的擁擠與人口的壓力。經過多次移民，我們的人口分佈仍遵循着胡煥庸的劃分。這條線上的城市與鄉村，與正被傳誦的中國經濟奇跡的故事沒有太多關聯。

我沒有期待的那麼興奮。我缺乏耐心地參觀完愛輝博物館，裏面盡是俄國欺壓中國的故事，他們搶佔我們的領土，屠殺我們的人民，掠奪我們的女人與財產，有時，你也不禁沮喪，為何我們總是處於劣勢，似乎除去康熙皇帝，我們從未打過一次勝仗。1975年，它剛建立時叫「反修博物館」，那是中蘇關係最緊張的時刻，距離珍寶島戰役僅僅六年，誰能想到僅僅二十年前，中蘇關係還密切得像是一家人，共同締造社會主義陣營來對抗資本主義。

愛輝只是個小鎮，除去博物館與黑龍江，就再沒可看的東西了。我在鎮上一戶老太太家裏睡了一覺，她爺爺一百年前住在黑龍江對岸，是江東六十四屯那場屠殺的倖存者。他拉着馬尾巴回到了黑龍江的這一側。新故事正掩蓋住舊傷痛。

愛輝屬於黑河市，像很多邊境城市一樣，貿易是它的締造者。我的朋友朱秀峰 1992 年來到此地時，正流

行着「南深北黑」的說法。南方的深圳因香港而騰飛，而黑河則因瀕臨俄羅斯而繁榮。期望沒變成現實，深圳一飛沖天，黑河連半飛都沒發生。

俄羅斯的皮毛與中國的輕工業品，是彼此的需要，最初的蜜月之後，相互欺騙摧毀了信任，貿易衰落了。很難說雙方誰更值得指責，多年的不信任再度爆發出來。

邊境的感覺沒那麼顯著，黑河和其他小城似沒太大區別，只是店牌下面多了俄語的標誌，售貨員會講俄文，夜晚街道上多了一些拿着酒瓶子的俄羅斯男女。黑龍江寬闊、深沉、神秘，但是站在黑河的江邊花園眺望對岸，除去建築更稀疏，並沒有特別的印象，就像是從長江北岸望着南岸。這是多麼可怕的感受，似乎你跑出了上千公里，就是為了再度印證所知的一切，似乎黑河市就是一個放大版的雅寶路。

在江邊，我們遭遇了一場未遂的鬥毆。兩個喝多了酒的年輕人，找茬和我們打一架。我很為自己的怯懦汗顏，繞過了他們的拳頭。當地的朋友還勸我嘗試俄羅斯姑娘的風情，在那些紅色燈光的房間裏，只需要兩百塊，就可以撫摸她們引人遐想的臀部。除去異國的風情，不管這些姑娘多麼落魄，她們還是白種人，似乎還有一種特別的權力，引發中國男人的征服慾。在一頓午餐上，一位當地的歷史學家給我講他的宏論：如果中國

想在未來與俄國的較量中獲勝，中國男人應該更多地前往俄羅斯，那裏男女比例失調，可以讓更多的俄國女人生下中國後代。

### 三

當郝秀榮笑起來時，你依稀可以猜測她四十年前的模樣。她會把頭半低下，用手捂住嘴，好像她又講了甚麼不好意思的話。

她已歷經歲月滄桑，身體枯瘦、頭髮花白，牙齒掉了大半，神情卻仍帶有少女式的羞澀。

我們坐在她家堆滿木柴的院子裏，前廳裏不時傳來稀裏嘩啦的麻將聲，風偶爾掠過，她那輕薄的絲綢褲子與襯衣就微微抖動起來。

「我沒甚麼後悔的，住在這裏挺好的，」她坐在我對面說，「有時回哈爾濱，反而覺得人太多、車太多。」這個院子在三池子南岸的一個漁村。五大連池位於黑龍江省松嫩平原的北端，因五個大小不等、彼此相連的火山湖得名。黑色的凝固溶岩石、高礦物質的湖水、沉睡的火山口，它是中國東北著名的風景區。

郝秀榮在漁村中擁有特殊的特殊。「她是知青，一直沒回去，可能知道得更多。」漁村裏黑龍宮道觀賣香

火的一位大嬸對我說。她騎着摩托車載我去見這位村中的「歷史性人物」。

穿過一長串的烤魚攤位，來到了村中的一排平房前，其中一些是小飯館——旅遊業越來越成為村民們的主要收入。郝秀榮家的天順活魚館尚未開張，她從一張麻將桌旁站起來，走過來和我們說話。

1963年，她來到五大連池，那一年她十九歲。她一直生活在哈爾濱南崗區的鐵道旁，在五個姊妹中排行第二。她從哈爾濱鐵路一中畢業後，還在松花江派出所短暫地工作過。

五大連池地區景色雖好，卻貧窮荒涼，而她則成為第一批前來支援建設的三十多名城市青年之一，他們都來自哈爾濱，都響應了黨的號召。

「那時候的路可不像現在這麼好走，」她回憶說，「我們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北安，接下來沒有車了，只有搭大轆轤，也不知換了多少次才到這兒。」大轆轤是拖拉機，在鄉間泥濘的道路上，它緩慢卻暢通無阻，突突地噴出濃煙。

她最初分配到的村子是第三池子的北沿，被劃分到十三連。城市姑娘開始學習打魚、補網、種地。她和同伴們像是被移植的草木，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成長，其中很少有人確信，他們還會回到城市。

青春的歡樂很快就蓋過了憂傷。「我都不知道那時候為甚麼這麼有勁頭，白天幹了一天活，晚上只要一聽說農場放電影，就會結伴撐船從北岸到南岸。」郝秀榮回憶時，青春風采復活了。

到了1967年，全國性的上山下鄉開始了，從北京、上海、天津湧來了更多的年輕人。他們一起學習種大豆、養豬、捕魚，他們一起聊天，打牌，在月光下的湖邊散步，交朋友，談戀愛。

郝秀榮就是這樣嫁給了生產隊的小隊長，他是本地的農民。他們很快就有了孩子，先是一個，然後又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變成了四個孩子的母親，一名家務熟練的農村婦女。1970年代初，郝秀榮一家從北岸搬到了現在的漁村，那時它是十連隊。

知青運動在1970年代末走到盡頭，郝秀榮早已習慣了鄉村生活，同伴們一個接一個地回到城市，她留了下來，她的新家庭已是六口人，實在不太容易再搬遷了。

她沒帶太多的遺憾，她的樂天性格幫助了她。她不怎麼為外界的變化所煩惱。兩個兒子就在村子裏打魚，就像他們的父親一樣，一個女兒在哈爾濱當工人，當地政府安排了這個工作，算是對這個知青家庭的補償。女兒似乎不怎麼喜歡城市的喧鬧，而經常想回到湖邊的老家。

似乎多謝我們的到來，郝秀榮又回憶起《野火春風鬥古城》，哼唱起《七十年代老歌》中的老歌。「那真是個好時候。」她淡淡地說，沒多一句解釋。她一心要留我們吃晚飯，或者明天再來吃午飯，她的女兒要從哈爾濱來看她，一家人又可以暫時地團聚了，距離十九歲懵懂地來到這裏，四十四年過去了，她對經歷的一切，沒有甚麼後悔。

五大連池的故事已經改變，沒人在意知青的故事。池子裏的水也不再那樣清澈了。池子邊新建的酒店正將污穢排入池水中，工廠也正在威脅它的水質。郝秀榮有些惋惜地說，白魚、紅尾魚再也看不見了。

#### 四

抵達伊春時，是傍晚七點。步行街上人群稀落，商店幾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這是最熱鬧的地點，最喧囂的時刻。

在等待本地的朋友時，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門口發呆，它是整條街上最後一家小店，店門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環播發同樣的短語：蛋糕麻花小甜餅……朗誦者的語速過快，甚至懶得斷句停頓。不知疲倦的重複，是中國商業社會最重要的推銷手段，從中央電視台黃金時

段的廣告，到賣鞋和雜食的街頭小店，都是如此。

天空逐漸變黑卻仍舊藍得透徹，盛夏的時節，空氣卻飄蕩着一股冬日的蕭瑟與感傷，步行街旁的樓房牆面斑駁，牆皮脫落已久。步行街上的大笨鐘開始報時了，報時音樂是《東方紅》。

我被帶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一個集體主義氣息濃郁的軍隊大院中，清晨六點有起床號，傍晚是下班號，食堂裏供應黏稠的米湯與因用鹼過多而變黃的饅頭，大院裏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共同的紀律塑造。它不是自由生長而是移植來的，不同的性格、家庭、夢想、口音與口味，被塞進了一個窄小的空間，為同一個目標服務。

伊春洋溢着這種氣氛。它位於黑龍江東北部，是小興安嶺的中心城市，它生產的木材和大慶的石油、鶴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樣，是火熱的新中國建設的象徵。就像大慶產生了模範石油工人王進喜一樣，馬永順是伊春的象徵，他是個不知疲倦的伐木工人，他們都有着「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豪情。

孫鐵軍是那股豪情的產物。我看到他時，他正挑着一擔水從院子裏出來。那連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漿、磚頭搭建的建築群分佈在半山上，這算得上伊春的貧民窟。他看起來四十歲左右，消瘦的臉上流露着一股淡淡

的憂傷。早晨九點的伊春，空氣清新，可以蕩滌掉我肺中所有北京的廢氣。陽光則穿過輕輕的雲層，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膚乾爽，甚至感覺得到毛孔的呼吸。

孫鐵軍出生於1954年。四歲時，他隨全家搬到伊春市。他的父親曾是朝鮮志願軍的一員，戰爭結束了，作為退伍軍人，父親被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貨公司當業務員。這座人造城市居民分成兩類人：林業的、商業的。前者採伐樹木，後者則為他們服務。但他們的界限隨着時間迅速模糊。

1969年，鐵軍成為了一名林業工人，在山中，他熟悉了透光、打帶、清林的工序，每月掙三十三塊。接着他成為了一名卡車司機，開着解放牌汽車運送被砍伐得整齊齊的圓木。1977年，他結婚了，伊春則迎來了她最繁榮的年代，中國正開啟經濟建設的浪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這裏擁擠着來自全國的代表。各地政府、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派人前來，都想獲得木材。

「到處都是外地人，甚麼人他們都要，我們這兒的所有人都有工作。」鐵軍的母親也突然插進談話。這個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煙，香煙夾在她左手的食指與中指之間，姿態異常瀟灑，她為志願軍丈夫生了四個兒子。此前，她一直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作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屬，每個月只能領到一百多元的補助。

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最寒冷的時刻來自 1993 年。林場的繁榮已經逝去，長期沒有節制的砍伐，沒人控制的盜砍盜伐，令數百年的森林開始蕭瑟，需要封山育林了；同時，國有企業的改革也開始了，積壓了兩代人的管理失調，要在一年中解決。

孫鐵軍對此有心理準備，這是全國性的潮流，而非僅僅他個人的挑戰，結果仍令他吃驚。「我做好了家裏有人下崗的準備，」鐵軍回憶說，「卻沒想到了三口人全部下崗了。」除去自己，他的妻子、女兒——分別在林場的財務科和保衛科工作——也下崗了。

二十五年的工齡最終以一萬八千塊錢作為了結，他的整個青春就值這麼多。令鐵軍耿耿於懷的是賠償數字的籠統，他這樣將近三十年工齡的工人，和那些工齡只十年的工人，沒太多區別，似乎相隔的二十年人生其實毫無價值。

那真是段難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籠子裏的雞，放出來之後牠還會圍着籠子轉，」孫鐵軍說，「現在回想起來，我都覺得害怕。」

我們見面時已是 2007 年 8 月，十五年過去了，他仍未完全從當時的震蕩中走出來。他們在國營的氣氛中成長，他們的家庭、愛情、事業、娛樂，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時已人到中年，生命開始由強壯滑向衰弱。

突然間，他要負責一家四口的生活，要交納養老金、醫療保險金。在即將開始的新生活中，沒有他熟悉的路線圖。他病倒了，一年後才逐漸恢復。像很多代的中國人一樣，當面臨社會的震蕩時，親戚、朋友、同學所締結的網絡開始發揮作用。他先是在山東遊蕩了九個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紹，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卻讓他呼吸到從未有過的自由空氣。

「我一口氣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從來都沒去過，哪裏有活幹，我就去哪裏。」他的足跡從山東到了湖北，從四川到了新疆，從廣東到了福建，他重操開車的老職業，在葛洲壩開鏟土機，在攀枝花卸貨，在新疆參與修路。

伊春的經濟沒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圍在兩座小山之間的市中心的商業區不再有從前的繁華。五十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輕人湧到這裏創造一座新城，三十年前，人們湧向這裏，尋找木材與機會，現在本地的年輕一代外出打工，下崗家庭經常全家遷走。

鐵軍的女兒在一家小商店賣書包，每月六百塊的工資是家裏的主要依靠。她的丈夫在大連工作，每年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們六歲的女兒在屋裏跑來跑去，一直想打斷我們和她外公之間的談話。

孫鐵軍覺得自己衰老了。那些遊歷令他大開眼

界，卻沒帶來太多的經濟回報，他在為每年要交納的一千七百元的社保基金發愁，聽說它要漲到兩千一百元。他還被胃炎、肝炎、膽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仍要不時去開長途貨運，經常連續很多天日夜兼程。

鐵軍的家裏乾淨、整潔，狹小空間裏的一絲不苟，顯示出他強烈的自尊。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崗的同事中，很多因為長期的積怨而一病不起。兩個月前，他又參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禮，不過五十歲出頭。「死得都讓人心寒了。」他說。

牆上掛着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記載着他燦爛而浪漫的少年時代。他曾是個音樂愛好者，當年這把三十幾塊的樂器讓他成為聚會的中心，他向少男少女們彈奏《游擊隊之歌》。但琴弦好久都沒被撥動了，以至於他忘記了如何調音。

## 五

一旦上路，你就意識到之前的理論準備是多麼可笑，具體、散漫、鮮活的人、物與場景很快佔據了你。除去孫鐵軍、郝玉秀，我還在一個星期五的中午，和元寶村的王村長討論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工業化問題。元寶村是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中的原形，它也經常被

視作「中國土改第一村」。我記得王村長穿一條淺藍色牛仔褲，條紋的、顏色暗淡的白T恤掩蓋不住的臉龐、脖頸、手臂上發紅的黑皮膚，臉部尤其突出，那是日曬和勤勞工作的證明。我喜歡他的臉，在不經意時，上面流露着某種莊嚴感。

我在小城依蘭停留了一晚。我所住的金島賓館還兼營洗浴中心，樓道裏暗紅色的燈光傳遞着廉價的色情味。在中心的商業區，照例是那一家接一家的店鋪，藍色、紅色、綠色的不同面積的店鋪牌，上面用黑體、宋體、隸書、美術字等各式字體書寫着店名、服務範圍和電話號碼，人們急於在給予的空間裏塞進所有的信息。縣城在中國社會的區域劃分中地位尷尬，它失去了村鎮的寧靜和人與人之間相對緊密的關係網，卻也沒獲得城市的自由與豐富。這是座古老、充滿掌故的縣城，12世紀時，兩位皇帝宋徽宗與宋欽宗正是從開封被擄掠至此，從一國之君變為階下囚，他們長時間居於形似枯井的土屋中，像豬一樣被供養，他們發呆，學會忍受屈辱。城裏修建了石磚城牆，把這當年的屈辱轉化成觀光業。在依蘭的牡丹江畔，我還遇到了一場意外的死亡，大批圍觀者遠遠地看着江心裸露出的河床上的女屍，白花花的身體上一抹紅色，好像是內褲的顏色。那是個清晨，人們幾乎歡笑着談論這個姑娘。

我路過了大慶，被它的傲慢所激怒。它龐大得沒有邊界，除去水泥路和樓房，似乎連一棵樹也沒有。我沒有採訪一個具體的人，覺得整座城市都是王進喜性格的延伸。他是毛澤東時代的模範人物，不顧生死地勞作，是中國石油自主的象徵。在大慶郊區的茂興鎮，我卻碰到了意外的溫暖。一家餐廳的老闆娘的身軀，讓我想起了聶魯達自傳中的場景，在一個短暫的時刻裏，我覺得東北與拉美不無相似，女人們都豐滿、健壯、不拘細節，似乎在表明她們是在一望無際的黑土地上而非在精耕細作的南方成長的；她們用不着精心隱藏與修飾，只需要直接表現自己的生命活力；她們不讓你輾轉反側、左猜右測，卻會用無盡的溫暖包住你。可惜，我沒有十六歲詩人的熱忱，喪失了表達愛慕的勇氣，甚麼也沒發生。在小鎮上一座寺廟裏，我坐在一個破舊沙發上，昏昏欲睡，幾隻不安分的蒼蠅在我四周飛舞，輕微地打破了那種黏稠的氣氛。那是中午，除去三兩個同樣昏昏沉沉的賣香火的老人，寺廟裏空空蕩蕩，不知那些僧人去向何處。

從這裏，我進入了吉林省。我對於白城一無所知。它位於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的交界處。它的名字很美，在蒙古語裏是查干浩特——白色的城堡。名字還催生了我不恰當的想象力：這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將看到

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長，還看到蘆葦蕩中的白鶴。

但白鶴僅僅是門前廣場上的雕塑，我住在吉鶴賓館，旁邊則是科爾沁賓館，但真可惜，科爾沁草原還要向北一百公里。我看到了高大、豪華的法院、政府大樓，經過一家叫維多利亞的夜總會，一條步行商業街、連成一排的餐廳和練歌房。我看了拆遷的老房子，抗洪搶險的紀念碑，似乎已廢棄一般的新興工業園區，一個早已乾涸的天鵝湖，一座空空蕩蕩的寺廟。在傍晚的廣場上，人們在跳舞，但是敲鑼的老人卻面無表情。我看到歷史或自然，空氣中沒有亢奮或不安、傲慢或憤怒，甚至一點小小的自得也沒有。它重複着所有中型城市的節奏，在中國巨大的變遷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黑龍江有一種憤怒的情緒。」哈爾濱作家阿成對我說。黑龍江曾經為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如今卻似乎被遺棄了，而到了吉林，憤怒也沒有了，只有茫然。

我在酒店的商務中心買火車票，接待員是個子高挑的姑娘。她平坦的臉因為重妝而略顯蒼白，嘴角上掛着顯著的厭倦。

「白城沒甚麼特點，就是風大。」她合起正專心閱讀的書說。從側面看過去，它該是羅伯特·清崎的《窮爸爸，富爸爸》。

「它真的對你有幫助嗎？」我問。她嘴角的厭倦立

刻消失了，轉而變成了興奮：「怎麼沒用，我雖然不能很有錢，但我看的這本可能幫我獲得財務自由。」

「那麼財務自由的目的是甚麼？」「創業唄！自己創業多好，就不用像現在這樣上班了。」談話被一個前來打字的客人終止了，剛才還沉浸在「人人都可致富」的夢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現實，那絲生動又凍結起來。旅途中，我總是碰到這樣的女人：她們的容顏比周圍人出眾一點，卻沒出眾到改變她們生活的程度；她們不安於現狀，卻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慣性。

## 六

我們放棄了穿越內蒙古草原的計劃——中國比我想象的大得多——直接飛到了大同。

大同是煤炭之都，是驅動中國的主要動力，還是人道災難的來源之一——礦難是不斷發生的社會新聞。政府、礦主、礦工、新聞媒體間形成了共生關係。一條人命變貴了但仍不值錢，它從三萬元上漲到十幾萬。大同還以「春情」著稱，過去它的窯子吸引着來自北方的商人、官僚、書生，而現在它則演變成了洗浴中心、娛樂城，它是北京的後花園——便捷、清潔、廉價。

在大同，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夜晚十點，我們沿

着新建南路走，它擁擠得像星期日的王府井。他們在散步，圍着小吃攤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鬧，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幾人在助陣。不知是路燈太過昏黃，還是空氣中粉塵過多，我在他們的臉上看到了油膩膩、混濁不清的東西，它的懶散不蘊涵着思考，而亢奮則沒有對應的創造力。我還在學習分辨他們的身份差異，這城市男人最時髦的裝束是黑色長褲配T恤，露出自己健壯或不健壯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帶着一串金光閃閃、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鏈子，頭頂則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點點髮茬。在本地，這是混得好的裝扮。

順着人群來到紅旗廣場，廣場三面被電信公司的巨大廣告牌包圍，另一面則對着大同的展覽館，展覽館是小型的人民大會堂，它正被一片廣告所包裹，最醒目的是「大同雲岡旅遊節」的橫幅。雲岡石窟、懸空寺從歷史塵埃裏站出來，幫助這座城市擺脫過度的資源依賴，連華嚴寺門口都有這樣的橫幅：「一切為了發展」。展覽館對面的雕像，是戰國年代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據說他是大同歷史的真正開創者。

你可以輕易地從記載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長歷史，它是北魏的首都——歷史上第一個與南方漢族政權抗衡的少數民族王朝。在漫長的歲月裏，它還是遼、金兩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漢人在這裏學會共同

生活。他們留下了寺廟、九龍壁，以及乾隆皇帝到此尋花問柳的傳說。

你來不及回望歷史，就被裹進了熱氣騰騰的現實生活裏。人們創造了很多簡單、粗陋卻有效的遊戲方法，在廣場上把很多大型、結實的氣球踢來踢去，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放聲卡拉 OK，在連綿不斷的小吃攤上吃來吃去。他們最鍾愛的是兔頭，據說一個二十八歲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頭王，一天能賣出三千個，每個月淨賺十萬元，真不知竟有那麼多兔子可以殺。一路上我都在想，總有一天，人們能用基因技術培養出有兩個、三個頭的兔子。

我去看雲岡石窟，那些佛像雕塑，那些被歲月、風沙、雨水侵蝕的石窟，流露着說不盡的滄桑。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殘損的佛像，在洞窟內散發着憂愁，但曾經它們蘊涵着人們對於極樂世界的渴望。

站在公共澡堂門口，我看到遠處的模糊石窟。這個小山丘上的澡堂，屬於一家國營煤礦的礦區，它的外牆被刷成天藍色。我貿然闖進，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推開門，透過騰騰的霧氣，我看到了三種人，洗過的人是赤條條的白色，而沒下水的人則是黑色的，還有半黑半白的，都抬起頭，整整一分鐘裏，他們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們，沒人問我來幹甚麼。



大同市內公園裏的現代雕塑